宋代雕版印刷
对诗文注释的影响

■刘美燕

关于雕版印刷术产生的年代，学界尚存在不同看法，但是其在宋代的繁荣却毋庸置疑。雕版印刷对宋代社会、文化的影响涉及方方面面，如教育的普及、士人的学风、学术研究的风尚等。其中，诗文注释整体面貌受雕版印刷盛行的影响就极为显著。厘清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更好理解诗文注释的发展进程以及雕版印刷在宋代社会引起的深刻变化。

地域分布上向刻书中心汇聚

宋代以前，诗文注释除了列于经史的单篇之外，主要集中在《诗经》《楚辞》和《文选》中，而两宋时期则呈现出盛极一时的局面。宋人编撰、整理了大量前代以及当代人的总集、选集、别集，并加以注释，甚至出现了所谓“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柳”之盛况。这种局面和雕版印刷的盛行有着直接关系。书籍的制作和传播在时间上更快、空间上更广、数量上更多、价格上更便宜，文化传播从抄本时代进入印本时代。

北宋雕印书籍主要依靠官府刻书，到了南宋，私刻、坊刻也兴盛起来，雕版印刷益加繁盛，南宋十五路都有刻书之处，并渐渐形成了两浙、福建、四川等刻书中心。如果我们盘点一下两宋时期有名的诗文注释家的籍贯，也会发现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出现在这些刻书中心。刻书中心逐渐形成的良好读书氛围对读者需求、注家素养的培养，刻书中心优越的出版条件、便利的文献检索条件对注家注释积极性的调动，都是宋代诗文注释形成如此地域分布特点的原因。

时间分布上集中在北宋后期至南宋

宋代诗文注本集中出现在北宋后期至南宋，杜诗注如赵次公注本、郭知达注本、蔡梦弼注本；韩诗注如洪兴祖注本、孙汝听注本、樊汝霖注本；柳诗注如张敦颐注本、董宗说注本、潘纬注本；李白诗的杨齐贤注本等，还有诸多宋诗宋注，基本也都出现在这一时期。

雕版印刷作为传播媒介是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北宋时期，政府对私刻和坊刻有严格管制，官方雕印书籍以经史与医书为主，到了南宋，政府对坊刻、私刻以及雕印书籍的种类不再实行严格管制，因此“雕板数量多，技艺高，印本流传范围广，不仅是空前的，甚至有些方面明清两代也很难与之相比”。对于这个时期的诗文注本来说，注释的意义也就与前人不同，他们的成果可以借雕版之便利远播四方、永传后世，甚至得到一定的经济利益。这就大大推动了诗文注释等在南宋的蓬勃发展。

风格上呈现学术化与商业化两种倾向

后人对于宋代的诗文注释成就往往有好坏之两极评价，究其原因，宋代诗文注本确实形成了学术化与商业化两种倾向，并导致水平参差不齐。这也与雕版印刷的盛行有关。

一方面，宋代书籍多且易得，使得宋人总体的文化教育水平、做学问的条件都远优于前人，因此，宋代的一些诗文注本在校勘、编年、释义、溯源上都取得了较高成就。另一方面，雕版印刷速度快，销售利润高，因此宋代一部分诗文注本以“速售牟利”为目的，校勘不精、错误百出，甚至伪托名家、欺世盗名。

理念上代际出新

求定本，在抄本时代，图书的编撰往往出于个人的阅读需求，因此同一种书异本异文很多。而雕版印刷却具有一本化身万千的特点，这激发了宋代的刻书者、编者做标准定本的雄心。在诗文注释领域，注家亦将此厚望倾注于所注之集子。

首先，尽心校雠。宋代诗文注释的首要工作就是“正文”与“疏谬”，以解决抄本时代异本异文多的问题。除了如方崧卿《韩集举正》、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等直接以“考异”“举正”命名的注本以外，其他注本也在校雠工作上花了很大力气，或就文字作增删改易，或就异文作校注存留，或就原书作整体面貌处理。其次，书定凡例。凡例是用于说明图书内容和编撰方法的文字，书有凡例，书的编撰方能有所可寻，呈现出规范面貌。宋代编撰的图书开始大量出现凡例，就集部注本而言，如廖莹中集注《昌黎先生集》、王伯大集注《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等。

集大成。宋代的诗文注本还表现出力求集大成的尝试。首先，底本往往求全本。宋代开始大规模整理前代及当代人别集，力求将该作家之作品搜罗殆尽，以存其全帙。宋代的诗文注家在底本选择上喜用全本，同时也做了大量的辑佚工作。其次，北宋后期以至南宋出现了大量集注本，汇集多家注释。如《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分门集注杜工部诗》等。再次，不少诗文注本集释义、探本溯源、品评多种功能于一体。

集注本的大量出现也和雕版印刷的推动有关。其一，书籍在成为印刷品之后，卷变而成册，其好处在于易于翻阅，于是便有了将资料汇集一处，进行比照核校的可能性，也由此产生相应的读者需求。其二，当书籍种类、数量激增，读者就面临如何选择的问题，汇集多种图书内容的本子可以解决这个困扰。其三，由于印刷书籍流传久远，编者往往做了面向多种类型读者的预设，需要在内容上杂糅各种方能适应需求。其四，当图书文献丰富、流通便捷，汇集各种资料，做到集大成方成为可能。

疑古求新。宋代学术有疑古之风，诗文注本在汇集各家成果的同时，辨其真伪正误，凸显自己新颖、独特的见解是不同于以往的一大特色。在印本时代，图书种类、数量之多使得学者若想著书立说，就必须追新求变，能够在图书市场上拥有一席之地。

重品评、重诗法。宋代以前的诗文注本以释义为主，这和经、史、子部并无区别，仅仅是为了扫清阅读障碍，解决理解问题。李善的《文选注》注重追溯词、句、艺术构思的起源，这是集部注释不同于经、史、子部著作的一大转变。宋代诗文注家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直接在注本中品评作家作品，分享阅读心得，总结创作方法，甚至借此提出文艺主张。这也从传统的角度得到部分解释。雕版印刷是一种大众传播媒体，使得著书者、编者以书“资鉴致用”的社会责任感更加清晰。诗文注本中品评诗歌、揭示诗法可以更加全面、直接地满足读者需求。

何为自主以及何以自主
——倪考梦论著《自主论》各家评论摘要

环境科学学科奠基人、中国生态文明理论创始人)

我与考梦相识已有15年。他是我在北京大学中国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后来也曾参与温州的生态文明规划和可持续发展实践。他在《自主论》中提出，自主不是抽象的“自由”，也不是虚无的“独立”，它是一个动态构成的系统。意愿、能力和资源三者之间的互动，决定了一个人能否真正拥有掌控自己命运的可能。他特别强调了“资源”维度的重要性。这使我想起了自己在几十年前提出的“环境承载力”概念。那时候，我的很多观点被视为过于超前，但我始终相信，科学不仅是为了创造工具，更是为了厘清边界、确立责任。今天读《自主论》，我感受到一种新的回应：年轻一代开始认识到，决定一个人命运的，不只是他有多努力，也包括他站立的土地是否丰饶，他生活的城市是否友善，他所处的时代是否给予他足够的空间。(摘自《自然是恩典，自主是回应》)

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知名传播学学者，中国互联网发展早期的思想启蒙先驱)

想起一位学者说过：“图灵测试不再是测试机器是否像人，而是我们是否还像人。”技术之海澎湃无边，我们若失去了定锚之心，自主便会被巨浪淹没。于是，自主不再是操作技能，而是一种深层的价值自觉。倪考梦说得好：真正的自主者，不是技术的抵抗者，而是技术的共建者。他们不是在科技之外喊“停”的人，而是在科技之内，灌注意志的人。他们既拥抱未来，也不放弃反思；既使用工具，也不交出主权。我们不该靠技术替我们设定善的方向。只有靠人类的自主，才能为技术赋予人性的光芒。(摘自《AI时代，自主仍是人类的最后一件事》)

张文字(浙江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

AI的发展路径被主流学术规划分为三个阶段：弱AI阶段、通用AI阶段与超级AI阶段。在超级AI阶段，AI在多方面任务能力可以全面超越人类，且涌现出机器自主意识与情感。我们不敢想象人类该如何面对一个万恶的AI魔鬼或一个仁慈的AI上帝。就在我们为上述问题而焦虑的时候，我发现倪考梦的《自主论》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答案。它温暖了焦虑者，鼓励了奋斗者，缓和了人机对立，用温和的姿态抚慰了那种无坚不摧、已经深深浸入当今数字社会每个毛细血管的高度内卷。(摘自《AI让机器越来越像人，而“自主”让人更像人》)

陈宝胜(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副院长，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温州学者倪考梦在其著作《自主论》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自主三角形”模

型，尝试从安全、自由、意愿、能力与资源五者互动关系出发，揭示当下个体“失去掌控感”的深层机制，试图回答在算法驱动、系统规训、技术扩张的条件下，个体如何重新成为其生活的主导者。该书虽然立足于个体经验，但其理论指向显然不仅是个人成长的心理路径，更是对整体社会秩序演进与制度正义的一种价值追问。《自主论》提醒我们，自主的危机并不在于AI是否取代了人，而在于人在“便利”的技术安排下是否放弃了自主。对此，制度应成为前置性防线，而非最后的补丁。自主性的制度保障，应当成为技术文明的基本配置之一。这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课题，也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能否走得稳、行得远。(摘自《技术治理时代的政治张力与自主性的理论回应》)

李伟(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中芯国际原副总裁)

《自主论》则集中体现了作者对技术与人性关系的深刻洞察。这本书不仅从个体自主的维度出发，探讨人工智能对意愿、能力和资源分配的影响，还将视角拓展到社会结构和文化层面，剖析了技术如何重塑我们的自由感和行为模式。我是一名长期从事芯片与智能系统研究的工程技术人员，我尤其赞赏《自主论》提出的“自主三角形”理论。这一模型将自主性构建为意愿、能力与资源三者之间的动态平衡，并强调在技术加速迭代的背景下，个体如何维持掌控力、避免成为被动的“工具人”。这与我在工程实践中看到的技术异化问题高度契合，也让我对“技术向善”的路径有了更具体的理解。(摘自《在AI浪潮中守住自主的底线》)

陈立翰(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中国心理学会工程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本质上是“认知的懒惰者”。我们本能地倾向于避免复杂思考，能省事就省事。而如今，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的飞速发展，正好给了我们一个“偷懒”的借口。从这个角度看，无论是作为个体的“自我”，还是作为群体的“社会”，都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挑战：如何在高度依赖技术的环境中，保持自身的“自主性”。倪考梦先生的这本著作，可以说是恰逢其时。它凝聚了作者18年的心血与思考，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我们揭示了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保持人格的独立性与完整性，如何坚持自主，提升工作和生活的效率，以及如何增强幸福感和满足感。在这个技术快速迭代的时代，如何跟上时代的步伐，做到终身学习？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实用的答案。(摘自《新世界大门的钥匙》)

袁岳(零点有数董事长、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副会长)

张建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原副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心理学学会前会长，亚洲社会心理学学会前主席)

在《自主论》中，倪考梦尝试将古典哲学、心理学与前沿技术相结合，搭建起一个跨越时空的理论框架。书中引用了从西方哲人到东方智慧的诸多观点，并将这些思想与现代生活紧密结合，试图为读者提供一种深刻反思的启迪和一种具体实践的指引。值得一提的是，《自主论》一书不仅仅是理论的阐述，更是对现实的回应。书中所述述的每一个观点和模型都来源于且扎根于生活实践，它尝试回答“什么是自主、为什么要追求自主，以及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实践自主”的时代之问。书中给出的答案，回应了现代人在追求安全和自由之间的内心挣扎。正如哲学家尼采所言，“成为你自己”是人生最艰难的任务之一。倪考梦对社会发展的敏锐观察和对人类心理的深刻理解，为追求自主的人们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提供了具体的路径。该书适合那些处于人生困惑中的年轻人，也适合那些在事业、家庭中寻找突破的成年人，甚至对于那些在职业生涯中重新思考生命意义的人们也带来了启发。无论是刚进入职场的新人，还是在事业中寻求新方向的管理者，这本书都能为他们提供一个自我审视的镜子和自我提升的梯子，为每一个渴望自我掌控的人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指南。(摘自《自主人，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

王春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原副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政策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温州，这片孕育了无数人才的土地，自古以来就以务实、创新、敢于冒险的精神著称。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温州人的商业活动中，更体现在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上。倪考梦的《自主论》继承并升华了这种文化精神。书中的自主思想，不仅仅是个人发展的动力，更是一个社会面对不确定性和快速变化时所展现的适应力与创造力的体现。温州人的文化精神蕴含在《自主论》中。就像我在研究巴黎的温州人社群时所发现的，温州人遍布世界，始终保持着强烈的自主意识与适应能力。这种自主意识不仅体现在经济活动中，也体现在他们的社会适应力和应对变化的能力上。倪考梦的《自主论》正是温州精神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延续与拓展。他从个体自主出发，系统阐述了意愿、能力和资源三者实现自主中的平衡关系，并提出了“自主三角形”模型。这一模型为每一个渴望自我主宰的人提供了清晰的思路与方法，既有理论深度，又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摘自《自主，人类社会从未停止思考的主题》)

叶文虎(北京大学教授，中国

梦不孤行，自主为路

■倪蓉桦

考梦告诉我，他的书《自主论》出版了。

我很高兴。考梦的书房里塞满了书，以前我曾多次对他说过，书架上有了你自己写的书，那就好了。的确，一个读书人，永远在读别人的书，而没有自己的著作，总说不过去。记得一年在温州某书城签名售书，我对记者说，二十年前，我在这里主要是买书，二十年后的今天，我在这里却卖自己写的书，感觉对得起走过的那些路。

其实，考梦也对得起走过的路。他嗜书如命，十八年磨一剑，水到渠成，今天终于有了自己的论著《自主论》。

《自主论》主要讲人如何认识“自主”，又如何实现“自主”。这个话题，十分沉重，尤其是如何实现“自主”，它关乎实践，作者非亲自下水游泳不可，它充满挑战性。为实现“自主”，我一生讲命运，也讲挣扎，从学校到机关，笔耕不辍，跌宕三十多年，才懂得实现“自主”是多么的不容易。而考梦，从一开始，就挑了这

块最难啃的骨头——没错，如何提出理论，给读者提供一条或可实现“自主”的有效途径，这是一个多么艰难的研究与写作课题啊！

我知道，为圆这个梦，考梦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除了拼命读书，还努力投身实践。他发动的“高温青年”公益行动，他组织与参与的“AI赋能文化”系列活动，都让许多不可能的事变为可能，给实现“自主”的理论作了生动而深刻的诠释。

当年，我给考梦取名字，一是希望他“追问梦想”，为自己开路。考梦自己却解释说，他的“考梦”，其实也是“解梦”，是对文明、文化的持续追问。他说：“文明是群体之梦，文化是时代之梦，自主则是醒着的人如何回应和掌控梦。”我细细体会，竟觉得三分熟悉——儿子走的这条路，走得比我远，比我深。

我不敢评论《自主论》的理论。坦白讲，它太厚、太深、太新，我老眼昏花，只能拾几页翻看。但我敢说，这是一本真诚的书，一本以心写意、以身写道的书。我读着那些文

字，仿佛又看到那个半夜挑灯的孩子，在埋头读书，在勤奋作笔记。2006年以来，他坚持每年读上百本书，总共作了500多万字的笔记。他没有偷懒，他没有糊弄，他是真的在把“人如何为自己负责”这件事，掰开揉碎，讲给别人，也讲给自己听。

在我看来，《自主论》最可贵之处，不在于它多么“高屋建瓴”，而在于它“脚踏实地”。他写人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中开垦出无限的可能，如何在不完美的时代里试图活出“自主”的模样。他写“人不能只是被动地等着命运安排”，也写“就算资源不对等，也能动一动、挣一挣”。这，不就是我，还有许多人一辈子走过的路吗？

我们父子有好多不同。考梦重理论研究，我重文学创作；考梦思想先锋现代，我思想传统比较保守；考梦爱讲世界格局，我爱讲乡村人生；考梦在城市里奔波，我在乡村里偷闲。但我们又如此相像：我们都坚信，人在命运中，不是棋子，而是有血有肉有情的执子之人；我们都坚信，生活可以靠自己的双手写出新的词章。

考梦送我书，我也送他诗——